

博物馆与集体记忆——知识、认同、话语

燕海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29）

提要：博物馆是记忆的载体与媒介。在博物馆中，记忆的生成、塑造和延续机制有三个层次。第一，展品自身的物理存在构成与参观者的沟通系统，并通过这样的沟通激发后者的回忆；第二，博物馆的展品遴选、展陈设计、路线规划、解说词的撰写等元素构成了符合某种历史话语的叙事系统，集体记忆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生成并凝塑参观者的文化和族群认同；第三，博物馆自身的历史——其概念的提出、展馆的设计与建设、展陈的叙事构建等过程——促发并强化相关参与群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

关键词：博物馆；集体记忆；叙事；话语；认同

博物馆不只是文化机构或是藏品的展示地，它们是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记忆与历史、信息与知识生产互动的场所。

——苏珊·克兰

2011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记忆”，2013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博物馆与记忆的关系不仅紧密，而且越来越为人所关注。陈燮君认为：“博物馆的记忆是历史的明镜和现实的启迪。”厄恩斯特则指出，博物馆学是关注作为集体记忆的文化要素的学科。无论是学界还是公共领域的讨论，博物馆与记忆的紧密关联显而易见。但是在阐释其关联时，我们必须对（集体）记忆本身的定义进行明确阐释。只有厘清“记忆”概念的内涵和机制（什么记忆？谁的记忆？怎样记忆？），有关博物馆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才能够进一步展开讨论。

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得到成体系的分析与解读，始自法国学者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哈布瓦赫将记忆视为社会的产物，认为一切记忆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与机制下才会得到产生与延续。哈布瓦赫将这类记忆称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强调记忆的社会性。他同时指出，集体记忆之所以能够得以形成和延续，一个主要因素是这样的“历史知识”对于个人和群

体自我认同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群体通过分享共同的回忆，能够获得深厚和坚韧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样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进一步塑造着一个稳定的集体和社区。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及理论从根本上让记忆与集体的勾连成为可能，同时，这种集体层面的记忆必然要在一定的空间维度中创造、延续、再生。在现代社会，随着传统意义的有机共同体被机械共同体所替代，一个社区群体所依赖的记忆环境逐渐消亡。历史的书写将发生在过去的信息以一种权威式的话语模式化、固定化，而曾经鲜活的“记忆”——凝塑群体精神的神话、故事、口头传说等，逐渐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被现代文明所边缘化。因此，哈布瓦赫称历史为“死去的记忆”。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记忆的空间也发生了转型。皮埃尔·诺阿将传统的、有机的记忆空间称为“记忆环境”，将现代的、机械的记忆空间称为“记忆场所”（sites of memory）。在诺阿看来，记忆场所越来越多，正体现着我们自身的记忆能力在下降，因为我们必须借助外界的符号来代替我们回忆，这些符号包括纪念碑、遗址地、博物馆，甚至是地图和节日。

诺阿指出，这些记忆的场所一旦成为记忆的载体，其所呈现和塑造的记忆便不再独立于权威话语的操控，在这里呈现或表达的所谓记忆，也不再是那些真正深植于有机的社会生活和生命中的鲜活记忆，而是成为一种话语建构的叙事（narrative）。

诺阿以法国近现代的记忆场所为例,发现这里所“生产”的记忆都肩负一个重要的政治使命,即构建出一套法兰西的民族话语与认同体系。通过一系列的纪念物、地图、文献搜集,甚至地图、节日等物质与非物质手段,法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记忆”被不断强化。正因如此,记忆场所的概念强调的并非记忆的内容,而是该场所构建记忆的策略与机制。

在诺阿的理论框架内,博物馆是最典型的“记忆场所”之一,博物馆的展品被迫从“记忆环境”中剥离,并重新整合进一套权威话语体系中,表达着特定的信息和“知识”。在西方博物馆的发展过程中,博物馆的主要功能经历了以审美情趣为核心到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转变。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审美的殿堂转型为公众教育的平台,博物馆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成为观念的传播者,甚至是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在型塑自身民族性和文化认同的功能之外,博物馆甚至曾作为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征服和控制的主要手段被广泛运用。

但是,作为记忆的场所,博物馆所表达的记忆并非自然而然地从这个空间中产生出来,它必然要依赖于一些特定的过程和机制。本文将通过笔者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印第安博物馆和大屠杀纪念馆的田野调查经历,描述并阐释作为记忆场所的博物馆如何唤起和构建集体记忆。笔者认为,博物馆与记忆的关系涉及三个层次。一是博物馆展品本身所呈现的记忆,二是博物馆的叙事所建构的记忆,三是博物馆自身的历史进程所表达的记忆。

展品与记忆

这里所指的博物馆展品,是抛开展品说明、摆放方式、灯光、保护技术等一切外在因素的,纯粹物理状态的展品本身。这些展品的存在构成了记忆的基本要素。参观者在观看展品的同时,会与展品形成一种沟通、对话的关系。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对同一个展品所触发的回忆可能大相径庭,因为一切视觉对象对观察者所呈现的意义,必然要受观察者自身所持有的历史情感影响。任何记忆的内容,都不可能独立于记忆者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按照英国心理学者巴特雷特的研究,根植于一

个人过往的社会生活,对过去的经历和记忆构成了心理上的一种构图(schema)。心理构图的差异,导致了对同一事件记忆的、理解的差异。

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对富有争议性的历史事件的记忆。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一楼大厅两侧是临时展品的陈列处,该馆2008年重新开馆之后,首批被放置在这里的展品中有一件非常引人注目,那是来自新奥尔良市的,曾在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中被雨水浸泡过的一个邮筒。这个邮筒原属于Lizardi街上的一家住户,这家住户的房子被洪水冲走,邮筒被发现的时候,正斜靠着一排铁质门廊。发生在8年前的这场飓风令大多数美国人记忆深刻,共有1836人丧生,是美国历史上因飓风丧生人数第三多的灾难。飓风发生时,全美各大媒体均滚动报道事件的进程,灾难的场景和画面震撼和冲击着美国民众。而身处灾区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更是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所以,当看到摆放在博物馆中的这个邮筒时,记忆必然会涌现。但是,因为与灾难经历距离的远近不同,来自新奥尔良的民众,与来自美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因邮筒而激发的回忆也有所不同。前者更倾向于回忆其经历灾难的第一手经历,而后者的记忆则多数来自于当时所依靠的媒体报道。笔者在访问该博物馆时,便遇到了来自于灾区与非灾区参观者的两种“回忆”。前者是一个黑人,面对邮筒,向笔者讲述了自己如何从家中逃出,如何搭车不得,如何舍弃家产,如何在暴雨中寻找避难所等经历。他的讲述语调平和,眼神中流露着一种经历过生死的淡定。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一对白人夫妇,看到邮筒后,开始谈起布什政府的种种不作为,言辞激烈,语气远比前者更为亢奋。

邮筒的案例显示出展品本身在唤起记忆中的作用,这样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个体的记忆,但在更深层次上,这样的记忆更是一种集体记忆的体现。这是因为,首先,这样的个体记忆必然与该个体的社会生活背景,以及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心理构图密切相关;其次,这种看似个人化的记忆,也有着广泛的群体特征。某些有共同经历的群体,对同一展品所表达的记忆结构也必定是类似的。

叙事与记忆

博物馆塑造集体记忆的机制不仅依赖单个展品的物质存在，更取决于其将诸多展品搜集、整理、展示的方式。更具体一些，对展品的讲述，对参观者的引导，对历史的再现，是博物馆最具力量的话语建构方式。正如厄恩斯特指出，历史信息是复杂凌乱的，无体系的，甚至相悖的。如何将这些凌乱的信息裁剪，如何从这些表面上毫不相干的展品信息中凝练、构建出一套成体系的“故事线”，需要靠叙事(narrative)，这是一个博物馆建构集体记忆的能力基础。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甚至是扭曲或是错误的。博物馆作为这样的记忆媒介，它的展陈设计、展品选择、历史叙述、图片说明等展陈的行动，都无不体现一种“选择性”。如何选择“正确”的展品，将其用“正确”的叙事逻辑进行有效的排序，这是博物馆营造记忆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博物馆都是历史的“修改者”，因为将不同展品用一个统一叙事方式贯连起来，必然要牺牲与这条话语主线无关的其他信息。但是，这样的“修改”并非贬义，因为现代博物馆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激发文化认同，传播一种被某个/些群体所认可的权威话语。所以，大多数博物馆都会设置特定的参观者引导路线，以某种固定的逻辑阐释、表达博物馆所强调的历史价值。在不同的空间之中移动、转换、前行，会使参观者融入到一种仪式中去，在这样的仪式中融入一个设计好的叙事框架，去接触和体验一套规范化了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中，有一个主题为“自由的价值——战争中的美国”的大型展览，展览内容为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的历次重大战争，依照时间顺序排列。其中包括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一直到今日的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为代表的反恐战争。虽然其叙事主线为时间，但展览的真正核心价值则是美国主流话语中的关键词——自由。无论是任何战争，其说明文字都无不突出战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自由。有了自由二字，所有战争也就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自不用

说，一战、二战是美国战士对来之不易的“自由”的守卫；朝鲜战争则是美国守卫韩国自由国家、抵抗“独裁的共产主义集团”的战斗；海湾战争和反恐战争则是美国的“自由”在受到伊斯兰文化挑战时，美利坚民族的抵抗。而在叙述越南战争时，展览对越战的非正义性轻描淡写，花费浓重笔墨渲染其时发生在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和反战浪潮，因为这些行为同样也是对“自由”的争夺。

在某种程度上，博物馆叙事中所呈现的历史是杜赞奇所论述的“大写历史(the History)”，以一套官方的话语体系，忽略甚至抹除这些官方话语之外的一切历史的枝杈。在这种“集体记忆”的建构中，官方的历史总是压制民间的历史，使后者没有表达和论述的空间。在博物馆对历史的再现过程中，叙事的话语体系与权力相勾结，任何知识或是记忆都无法摆脱这样的话语塑造，它们也必定是话语操作者的对象与产品。

也有一些博物馆的话语建构策略并不依照特定的事件线索进行，而是突出一种空间逻辑。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印第安博物馆中，有一个展区汇集了8个主要印第安族群的文化要素，每一个族群占有一块区域。这些族群中，有的原始居住点位于东部，有的位于五大湖地区，也有的位于西部。不同的空间地理，赋予了不同族群截然不同的生理特征和文化特质。这样的空间逻辑意在表达两个“知识”。一是表现印第安人作为一个被西方殖民者强加的族群概念并非一个同质的群体，其本身的差异性巨大；二是尽管存在着种种差异，在今天的美国，这些历史上互不往来甚至兵戎相见的族群，都能够内化在以自由、多元为主流精神内核的美利坚民族的认同语境中，形成超越族群界限的“美国认同”。这种空间叙事表面上在表达一种差异性，而实质上却是在塑造（甚至发明）不同文化、语言、群落之间的同质性。

要表现这样的同质性，单纯依靠展品自身的话语力量显然不够，还必须要通过精心打磨的价值传输策略。在展览中，设计者采用大量的多媒体技术和互动技术，让印第安后人出现在屏幕中，亲口讲述自己的历史、生活、文化和认同。由于不同族群生活的特质，8个板块的主题多元性很强，有的

族群擅长捕鱼，他们的展厅便突出捕鱼的传统，而有的族群生活在北方，与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相同，板块背景便突出冰雪世界的生活情景。8个族群汇集在一起，一副“壮丽的大一统的美利坚”便自然而然凸显出来。

这个展览的路径设计也力图表达一种文化的多元平等性。与用一条时间线对游客进行引导的方式不同，空间叙事并不“刻意”引导参观者，而是把整个展览的不同区域“并置”(juxtaposition)，即游客可以自己决定参观的先后顺序，从一个族群的板块，可以进入另外几个板块，并没有一个设定好的路线。这样的自由导览方式，表述出博物馆对不同文化、族群的平等对待，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文化平等的价值观表现给参观者。

图片及说明文字也是话语建构的主要策略。在展厅的入口处，是一排巨大的照片墙，上面排列着许多普通印第安人的面孔，有孩子、老人、男人、女人。这些面孔虽然都是印第安人，但肤色、脸型、头发、眼睛等都差异很大，有的接近东亚人的面孔，有的则偏向白种人。伴随着照片墙的是一段引导词，讲述“谁是印第安人？”。

你身体哪部分是印第安的？你的头脑？你的心？或许是你的思想？但是，决定你印第安人身份的，肯定不只是你的血统……我们的生命属于一切为了反抗种族灭绝、歧视和成见战斗过的人。

这一段解说词，明确指出一个多元的文化不以人的外貌生理特征来区分，而是通过人的精神、人的文化价值、人的共同记忆和未来加以凝合。记忆在这样的展栏里占据了极大的比重，通过文字的表述，通过在纪录片中的口述，传统生活与族群经历被一遍遍表达和强化。这种“分享”式的信息传递模式同时承载着集体的话语力量，在塑造族群内在同质性的同时，也强化着族群的边界。

在印第安博物馆中，民族融合、国家一统的话语体系甚至渗透到了儿童参观互动的板块。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区域为儿童设立，这里用五颜六色的背景构建了一个印第安人生活的美丽世界，进入这个世界之前，每一个小朋友都能获得一本“护照”，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探索、发现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印第安族群。每到一个族群点，就在护照上盖上对应的章，当走完所有族群点之后，护照上会盖满了章。

鼓励参观者与博物馆的展品和展览互动，是现代博物馆的一个主流趋势。尤其是此类儿童区域的互动，以“完成任务”的方式增强参与度，对他们理解博物馆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参与”又能够向他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真正的历史是否对孩子来说太过残酷？这种干净的、田园诗一般的、大一统的美利坚印第安民族的古老生活，会不会导致他们将自己知识结构中的印第安人的生活“迪斯尼化”？印第安博物馆中的儿童互动区域，与其说是在传递印第安的知识，不如说是在利用一种娱乐化的方式，重新建构印第安的历史面貌和环境，以呈现一种美丽伊甸园式的新世界。让他们拿着护照在不同族群点之间行走、盖章、完成任务，这同样是一种仪式性的方式，表述着一种国家完整性的话语：一个族群都不能少！通过这样的仪式，让孩子们“学习”一段被建构的历史记忆。实际上，笔者在对一些成年参观者的交谈中发现，这种美丽图景和国家一统的话语建构，对他们同样有极大影响：亮丽的地毯、花哨的小木屋、干净整洁的卧室、和睦的大自然、融洽的族群邻里关系，这便是有关印第安的“共同记忆”。在这一点上，儿童互动区域的叙事逻辑和上面提到的图片墙的叙述逻辑是同构的：田园诗一般的印第安生活，尽管曾经遇到困境，但是生活在延续，“我们”重新融合进了美利坚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从这一点上看，谁又能说美国的博物馆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呢？

博物馆过程与记忆塑造

我们已经阐述了博物馆中记忆塑造的两个层次——文物自身的记忆与展陈方式所营造的记忆。但记忆的塑造过程并未止于这两个层次，博物馆自身的“过程”——其方案提出、设计、建设、布展、开放、管理的每一步，都深刻影响并塑造着特定群体的集体记忆，并凝塑种种文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讨论甚至冲突对集体记忆形成的影响，甚至要比建成后的展陈和文物所体现的记忆表现得更为强烈和具有冲击力。

关于灾难的记忆，是许多西方博物馆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笔者曾不止一次参观过位于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应该说，（犹太）大屠杀作为一个民族性极强的历史灾难记忆，在全世界已经建立起

一个超越文化界限的反思性的话语体系。但是，这样的普世话语的建立，不仅离不开后人对历史的学习与传承，同样离不开在这些学习和传承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及其记忆。在回顾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的历史时，笔者发现它的建造过程异常曲折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叙事、话语和记忆被不同群体所操纵和争夺，它一时间成为美国族群记忆争夺的阵地，成为了不同的集体记忆碰撞、争斗、融合、妥协的空间。而这些记忆及其呈现的民族认同，也在博物馆建设的争论过程中得到再现、强化与升华。

在《保存历史——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建立过程的争斗》一书中，作者爱德华·林恩特奥回顾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从最初提议到最终建成的历史过程。在最初的提议时，卡特政府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纪念场所以缓解当时比较紧张的美国政府与美国犹太社区的关系。但是，事与愿违的是，纪念馆的设计过程从最初的选择委员会代表开始，便陷入了一种矛盾当中。犹太社区强调“大屠杀”（The Holocaust）这个词只能用于指称二战时期德国人针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行为，在他们的叙事中，犹太人是“第一受害者”（the first victims）。但是，以波兰人、乌克兰人为主的东欧社区则声称，那些死于大屠杀的500万非犹太人同样应该被纳入到纪念的范围内。两个群体针对“大屠杀”究竟应如何定义，纪念馆应如何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进行回忆等问题产生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在争论中，这些民族不断“发现”自己几乎遗忘了的历史，如美国的乌克兰民族信息服务组织负责人就曾骄傲地说：“乌克兰人才是欧洲最早、最有效地对纳粹的屠杀行为进行抵抗的民族！”同样，大屠杀纪念馆的建设引发了亚美尼亚和吉普赛后裔的激烈反应。这些族群的领袖认为，如果发生在二战的大屠杀应该被广为纪念，那么发生在这之前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和吉普赛人的屠杀事件，同样应被纪念。而犹太群体的反应则如出一辙，他们不认为世界历史中有任何一场其他的大屠杀能够与“犹太大屠杀”相提并论。

整个纪念馆的建设过程充斥着不同记忆和话语的争夺，激发了不同群体对自身历史和记忆的反思。在争论过程中，博物馆的定位和其所展示的记忆内容被不断改变，其间甚至有管理者不堪重负辞职。而无论最终争论的结果如何，这个争论过程本身，即是集体记忆在互相冲撞、融合、反抗、重塑的过程。参与到争论中的行动，也是不同族群认知、感受、强化自身集体记忆和群体认同的过程。这些争论的发起者和族群的代言人，都是在知识界和政界掌握话语权的人物，博物馆的建造过程中的争论无形中加深或冲击了这些人对一段历史的集体记忆，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利用自身的社会地位塑造历史话语的意愿与能力。

结论

博物馆是记忆的场所，是话语建构争夺的空间。博物馆的意义并非完整重现历史，而是通过对零散的历史信息的搜集和系统化，向观众呈现一种依照特定逻辑进行叙事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所表达和“再现”的是博物馆设计者和管理者力图构建的一套价值论述。因此，正如对历史的掌控便是对未来的掌控一样，对博物馆的争夺，本质上是对话语权的争夺。通过博物馆的展品、叙事，及其建设的过程，不同个体和群体都能够参与到记忆的沟通、共享、塑造、再现的过程中来。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或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强化，这也是博物馆塑造记忆的核心机制。

在华盛顿的三家博物馆的田野考察，印证了福柯所言的知识与话语的互相勾结、互相塑造的关系。表面上是在普及和传播历史知识，而本质上却是通过特定的叙事逻辑塑造和强化一套符合美国“政治正确”的自由+多元的民族话语，以凝塑美国人的国家和文化认同。博物馆作为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场所，它的作用不仅仅是文物的“储藏库”（storage house），更是信息和价值的“媒介”（medium），它通过分享和表现历史信息与知识，通过各种媒体的方式，书写着这些信息和知识背后的“大写历史”。

作者简介：燕海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馆员，博士，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文化遗产、全球化。
E-mail: haimingyan@outlook.com